

教宗致函在中國的教會：五年後的反思

斐洛尼樞機

二零零七年對聖座與中國的關係而言，是關鍵的一年：香港回歸十周年，以及鄧小平倡議中國與世界接軌的三十周年。我曾經在香港居住好幾年（1992-2001年），一直關注在中國的教會的生活，當時教會正步出漫長和嚴峻的迫害。由於職責所在，我數次前往北京，對中國的經濟進展留下深刻印象，並對教會的未來寄以厚望。教會

痛苦和忠信的歷史，連同那些為信仰而受苦的修者和致命者，散發聖德的芬芳。看來教會的苦難，不可能比以前，尤其比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時所受的苦還多。可是，教會不僅在內部，而且在與政府的關係上，仍要面對極大的挑戰。中國與聖座之間的交往也困難重重，此關乎歷史、文化、政治的層次，也涉及相互瞭解的難度，以及對問題看法的不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五年逝世，他訪問中國的宿願無法實現；然而，他所留下的豐富遺產：就是他對中國教會的熱愛，對那些與伯多祿繼承人失去圓滿共融的人那份像父親般的關懷，以及對中國人民的衷心欣賞和深情厚意，在

不少場合中，我成爲這些事實的直接見證人。二零零七年，本篤十六世徹底審察當時的情況，認爲中國與聖座建立關係的日子，客觀看來，不會太近，所以必須致力鋪路的工作，首要的任務是公開表明：聖座面對中國教會複雜情況所持的態度；其次表明何種態度是中國教會本身從內部所期望的，以便理順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最後聖座孕育了何種心態以面對中國政府。

在此背景中，誕生了教宗的函件《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簽發。

聖座面對中國教會的複雜情況

經過多年的研究，聖座清楚地察覺到，在中國的教會整體上從未陷入裂教的情況。我在香港的時候，曾用一個類比來形容發生了的情況。就歷史而言，自起初中國的福傳工作曾是忠於福音

的：基督是唯一的泉源，而由這泉源誕生的教會，就好像一條清澈的河流，因地勢的不平（歷史的變幻），蜿蜒曲折。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地震使這條河的生命起了扭轉乾坤的變化。因此部份河水滲入地下，另一部份繼續在地面流動。按類比而言，教會的一部份成員不接受妥協和政治控制，而另一部份則爲了存在性的考慮而予以接受。有人會問：這兩股水流會否有一天自由地、公開地匯合？當然，在基督聖心慈愛的浩瀚海洋裡，最終會殊途同歸。但是，在歷史過程中，在中國的教會有可能再一次出現有目共睹的合一嗎？

正如前文（第二段）所述，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函的目的，是就教會在中國的生活和福傳工作提出指導思想。該信函的主要目的並非政治性的。根據教宗，中國教會應在自身內重拾邁向修和的意志和力量，而當務之急，就是消除成見和干預、分裂和默許彼此憎恨與互相蒙混行爲，爲此，必須踏上真理、信任、淨化和寬恕的旅程。

所涉及的主體包括四方面：所謂「地下」團體，即未經官方政權認可的教會團體；以及所謂「愛國」團體，即獲得政權承認團體；還有聖座以及北京政府。

事實上，這些主體相互牽動，而形成多邊關係，包括公開的和隱蔽的、明智的和輕率的、審慎的和粗暴的。因此，修和之旅將難以實現，假如聖座和北京之間缺少了與此旅程同步進行的對話，對嗎？

兩股「水流」之間的對話

按初步分析，我們要承認，教宗信函所表達的期盼遇到重重困難，此乃源自外來的壓力，也出於這兩股「水流」之間的誤解。經歷數十年的分隔，彼此之間已挖掘了鴻溝，又建立了圍牆，因此，對教會內部造成的創傷，至今仍然存在。

鑑於尋求真理是對話的前提，由此而導向寬恕與修和。正如教宗所言，在持久衝突的狀態下，

不可能為當前問題找到解決方案，那麼，中國教會的兩股「水流」務須正視這一點，只要兩者回到對伯多祿繼承人的忠貞和服從的基礎上，死結便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仰統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見的中心與基礎（參閱梵二，〈教會憲章〉18）。

聖座與中國政權的對話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教會的信函中，一開始便強調現有的問題不可能在聖座和北京政權持久對立的情況下去解決，為此，信函開宗明義作出明確和公開的聲明：「隨時準備作相互尊重及建設性的對話」（P. 4）。迄今，如此明示的善意和開放從未絲毫減弱。當然不論是聖座或中國——一個崛起的大國，雙方行事的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不禁會問：難道尋求解決方案便遙遙無期嗎？

從聖座角度來看，要進行對話（不但與中國，

也與世界其他每個國家)，該先創造甚麼條件？首先，有些條件是先決性的，例如：互相信任、平等對待、確立意願，即願意進入對話，以及遇上困難時仍願意持續對話。聖座遵循教會建立者基督（的意願，維護教會的四人特性，作為對話的準則。這些特性是指：至一性，包括主教之間的合一，與教宗的合一；至聖性，包括牧者們的堪當性和適合性（譯按：天主教法典377第2項）；至公性（又稱普世性），包括全部和完整的信仰；從宗徒傳下來的特性，意謂教會的根源和架構與宗徒的承傳息息相關。聖座也清楚意識到，這些特性是在每個民族的具體環境中體現和生活出來的，並密切地使真正的文化價值透過融入基督信仰得以提昇。因此，在中國的教會如同在各國的教會一樣，儘管在表述上各有特色，但常容許信友在實質上和感覺上，既成爲十足的教友，也不失半點中國人的本色。

自從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信函

發表以來，已有五年之久，期間聖座與中國的關係看來是高低起伏。簡而言之，容我列出最近出現在兩者之間的三個絆腳石：

1. 二零一零年，北京當局主辦全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此舉使政府對教會的控制更形尖銳，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行。與此相關，當局向所謂「地下」聖職人員加強施壓，逼他們加入愛國會這個控制中國教會的機構，其目的是要使教會獨立自辦、失去其至公性和脫離教宗。同時，愛國會亦加劇對所謂「官方」教會的控制，操控他們的主教、神父、敬禮地點、財政和修院（例如：當局委任一名政府幹部擔任石家莊大修院副院長，導致修生罷課抗議）。

2. 嚴格控制主教的任命，導致屢次選出具有爭議性的候選人，甚至這些候選人在道德操守和牧民事工上都不合格的，卻得到政權鼎力支撐。這些任命都是外表裹著選舉的

糖衣，為此，而事後參與者往往因事態嚴重，便立即以信件或其他形式（向聖座）提出反對。

3. 主教的祝聖，不管合法與否，都在禮儀中被逼接納一些非法主教的參與，他們的臨在使被祝聖者和祝聖者受到良心的嚴重譴責。

或許有人未能妥善地接受聖座的一些反應，也許他們不甚瞭解，也許他們沒有顧及聖座之所以作出這些反應，無非是對一些固有的價值忠信地持之以恆，這些價值皆屬教會的信理和教會的傳統，這樣，教會的原貌才可獲保障。然而，歸根究底，聖座的措施總是出自對中國天主教教友的真誠的和深度的尊重。

中國教會與國家

在中國的教會依據其由基督承受的使命，要求享有自由來完成使命，不願受到政權干預；教

會一方面遵守國家法律，另一方面尊重真理、正義和合作的原則。有一次，一位年長的中國神父對我說：「在中國，我們天主教教友所得到的自由，只不過是籠中鳥的自由！」事實上，在中國的教會並不要求任何特權，更無意取代國家的位置，當然也不想成爲政治團體；一個是教會，一個是政治團體，兩者彼此獨立，互不混淆，但另一方面，教會卻樂於爲公益而作出貢獻。

教會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在具體的中國情況裡一直是嚴峻的。一些主教和神父遭到隔離，人身自由被剝奪，正如最近上海教區的一位主教馬達欽所遭遇的一樣。其實他祇是宣佈了希望投身於全職牧民職務上，擱置那根本不相稱於牧者的工作。

在此事之後，個人和機構所受的控制更爲尖銳，當局也比以前更輕率地施以洗腦及強壓的手段。

當缺乏宗教自由時，或者宗教自由受到嚴重

限制時，難道整個教會不是有責維護中國信友的合法權利嗎？而聖座不是有責率先為無聲者發言嗎？

信函面世五年，還有可能孕育希望嗎？

羅馬與北京之間的對話，已作多次嘗試，但限度極大，這是有目共睹的。真誠相對和彼此尊重的對話，確是眾望所歸，正如教宗在信中所期盼的一樣。對話要求雙方有直接和定期的交往，但二十多年來的接觸，並未能產生預期的成果，反而在接觸時，卻不乏欠準確和欠完整的訊息、誤解、指責和僵局。

人們不禁要問：展開新方式的對話的時機不是已到了嗎？這對話方式甚至可以更為開放，更為對等，以至善意、信任和彼此尊重不為私益所破壞。聖座和許多國家都有開放和率直的對話，例如聖座和越南找到了雙方交往和發展友好關係的模式。北京與台北之間不是也設立高層次的特

定委員會來處理相關的問題嗎？難道不能盼望聖座和中國也可進行適當和坦誠的對話嗎？

中國是大國，世界各處都有華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走上與世界接軌之路，有多少神父、聖職人員、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曾在世界各地的修院和天主教機構受培育！難道他們受人慫恿而忘了國本嗎？也許他們被逼跟隨一個違背良心的信仰？假如這些中國移民（為數不少）要求受洗，他們豈不享有其他受洗者同樣的權利？在一個愈益開放、愈加相互依存的世界裡，怎可想像：中國的天主教教友祇因為留居在自己的國家裡就被孤立起來？

本人多次與中國的朋友交談，他們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在自己的家鄉裡卻因著自己是教友而蒙受羞辱，可是在其他地方卻受到尊重和欣賞！中國政府能夠對眾多百姓的呼聲充耳不聞嗎？儘管在過去五年中，有些積極的訊號，曾一度泛起期盼，卻轉瞬減弱。這使我想起一例，在

二零零八年中國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團爲教宗舉行的盛大音樂會，無論如何，那仍是非常正面的歷史事實。

對教宗信函邁向更完善的解讀

教宗致中國聖職人員和教友的信仍是有效的。五年以來，在中國教會所發生的事件重申這信函的價值、合宜性和現實性。過去因著躊躇、懷疑、恐懼和局限，拖慢了對牧函的認識和理解，但如今，新的局面出現了，使人更完善地理解教宗的信，這信既可成爲在中國教會內對話的起點，又可促進聖座與北京政府之間的對話。

教宗本篤十六世期盼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宿願能夠早日實現。十年前，真福若望保祿二世已宣稱：「聖座期盼以整個天主教會的名義，我相信，也爲了全人類的利益，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放對話的空間，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爲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

往的誤解之後，彼此可以一起合作。」（信函，p. 7）因此，聖座的期盼是一個對話，那對話能對中國天主教教友、忠信的中華兒女，展現出應有的欣賞，又能結出和諧與平安的果實，這果實遠遠超出聖座和中國所能預見的效益。教宗的信仍然是一個以宗教爲主的文件，其目的是以真理和毫不含糊地，在中國教會內開闢修和之路。

因此，這宗座文件在我看來仍是了不起的依據，它突顯教宗對真理和政治公義的熱衷，以及他對天主子民的愛護；此外，文件又能把教會信理、政治視野和公眾利益融會貫通，非比尋常。

教宗的信函正等待一個回應！

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斐洛尼樞機

二零一二年十月廿二日

□